

中國近代思想史論文集

上海人民出版社

中国近代思想史论文集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58年

中国近代思想史论文集

*

上海人民出版社编辑、出版

(上海绍兴路54号)

上海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001号

上海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

开本850×1168公厘 1/32 印张6 13/16 字数154,000

1968年7月第1版

1968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1—6,500

统一书号：2074·87

定 价：(9) 0.90 元

出版者說明

一九五二年，北京大学哲学系中国哲学史教研室組織教研室的教师，写了二十七篇关于中国近代思想史的論文。一九五三年，教研室以这些論文为基础編写了“中国近代思想史講授提綱”（人民出版社一九五四年出版）。本社从二十七篇中，选出十五篇，編为本文集。出版前作者只在文字上作了修改，各篇論点均保留原样，未予改动，特此說明。

一九五八年一月

目 录

鴉片战争与林则徐	馮友兰(1)
魏源底思想	馮友兰(11)
馮桂芬的思想	周輔成(26)
王韜的思想	王維誠(36)
薛福成的思想	黃子通(51)
馬建忠的思想	任繼愈(66)
何启、胡礼垣的改良主义思想	任繼愈(75)
陈熾的思想	周輔成(92)
郑观应的思想	周輔成(99)
康有为底思想	馮友兰(110)
梁启超底思想	馮友兰(128)
章太炎的思想	王維誠(142)
蔡元培的思想	馬 采(163)
李大釗与陈独秀的思想	石 峻(173)
傳教士林乐知、李提摩太的思想	
——帝国主义奴役殖民地人民的工具	馮友兰(200)

鴉片战争与林則徐

馮友兰

(一) 鴉片战争前清朝統治阶级对西方 资本主义国家的認識

在十九世紀中叶中国还是停滯在封建社会这一历史发展的阶段上,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如毛主席所說的,“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占主要地位。农民不但生产自己需要的农产品,而且生产自己需要的大部分手工业品。地主和貴族对于从农民剝削来的地租,也主要地是自己享用,而不是用于交换。那时虽有交换的发展,但是在整个經濟中不起决定的作用。”(“毛澤东选集”第二卷,第六一八頁)

在这样封建社会底經濟基础上,又建立有一套頑强的上层建筑以巩固这样的基础,首先是以专制皇帝为首的地主阶级統治制度。以清朝皇帝为首的封建地主統治阶级,觉得自己是“无所不有”,“至高无上”,深恐外来的影响,会与現存的社会制度不利。清朝以异族統治,本来滿汉的矛盾,已极尖銳,更恐中国人民得了外援而反对它,所以厉行閉关政策。还有傳統的封建主义哲学所宣傳的,“乐天知命”、“安貧乐道”、“知足”、“尚儉”的人生观,“重农抑商”的經濟政策,也是“閉关政策”底思想上的背景。这样的思想是封建社会經濟制度底反映,反过来又巩固这样的經濟制度。

这样的思想表现在外交公文之内。一七九三年(乾隆五十八年)清朝乾隆皇帝“敕諭英吉利国王”說:“天朝拥有四海,惟励精图

治，办理政务。奇珍异宝，并不貴重。”“无需尔国制办物件。”同年又“敕諭英吉利国王”說：“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借外夷貨物，以通有无。”又說“天朝自开辟以来，圣帝明王，垂教創法。四方亿兆，率由有素，不敢惑于异說。……妄行傳教尤属不可。”（魏源“海国图志”卷七十七引）这是在鴉片战争以前，清朝封建統治階級对待外国的态度。西洋資本主义国家所用以侵略东方的两大工具是“通商”与“傳教”。前者是經濟侵略，后者是文化侵略，清朝底統治者一概以“閉关政策”来应付。他們这样的应付并不是为中国人民底利益，而是要以此巩固他們底統治底經濟基础。

关于十八世紀以来欧洲資产階級大革命，中国也得到一点消息。一八〇四年（嘉庆九年）英国王佐治第三給嘉庆帝信上說：“佛兰西国已乱了十三年。佛兰西老国王为人甚好。竟被伊国人弑害，深为可憫可恨。如今伊国有一人做了国长，存心无道，意欲惑乱人心，使通国之人，不顧五倫，不畏天地。我想伊断不能惑中国。大皇帝英明素著，必能洞察其奸。”（同上）这所說“乱了十三年”，就是法国大革命。这所說的“国长”，就是拿破侖。法国大革命使欧洲正式地进入資本主义社会。佐治第三报告中国底封建統制者以这个封建社会底“警訊”，想要中国統治階級共同反革命。这个消息可能使封建社会底統治者增加对西洋的歧視。

（二）鴉片輸入及中国的地主階級

知識分子底各种对策

在近代資本主义国家向东方擴張底时候，中国成了他們侵略底对象。但是照上面所說的經濟、政治、思想情况，中国不是可以輕易侵入的。专靠正常的商业，他們并不能占到便宜。那时主要侵略中国的国家是英国。为了要进中国底大門，它就用最下流最

恶毒的手段，那就是向中国輸出鴉片。

地主階級中大部分的人本來都是“飽食終日”，專門尋找享乐的。鴉片恰合乎他們的需要。他們首先吸鴉片烟，后又引誘人民吸鴉片烟。鴉片越來越多，中國所受的害越來越大。害有兩方面：一方面是使吸烟人底身體日趨衰弱，精神日趨萎靡。另一方面是使中國底財富大量外流，其具體的表現是白銀大量流出，銀價越來越貴。

當時統治的地主階級每年要向人民勒索一定數目的銀兩。銀價越貴，人民所受的剝削就越重。地主階級也感覺到長此下去，政府底財政會要破產，社會底經濟會要崩潰。銀荒引起當時普遍的恐慌。英國資本主義與中國封建主義的矛盾，發展成為“外夷”與中國的矛盾，而日益尖銳化。

在這樣的矛盾中，中國几千年的封建主義社會開始崩潰。地主階級開始分化，有企圖完全維持舊制度的保守地主，有傾向於注重商業手工業因而部分地反映商人手工業者利益的開明地主。地主階級底知識分子對於解決上述矛盾，也有不同的對策。有反映保守地主思想的對策，有反映開明地主思想的對策。前者提出下列的幾種辦法。

一種辦法是完全禁用洋貨，例如管同（道光乙酉舉人）說：“洋之人作奇技淫巧以壞我人心，而吾之財安坐而輸于異域。”他認為中國在洋貨輸入以前，本有自己足夠的衣服器用，完全用不着西洋來的奇技淫巧。他說：“國家之制，販粟出洋者，官吏之罪，至于大辟。夫粟之與財，其為國與民所資也奚以異？以粟而易洋之財，與以財而易洋之貨，其為傷民資而病中華也又奚以異？今也獨禁粟而余皆無所禁，是知其一而不知其二者也”（“禁用洋貨議”，“經世文編”卷二十六引）。

这种办法是消极的办法，就是禁止洋貨輸入。另外还有人提出更有积极性的办法，例如徐鼎（道光乙巳进士）底“务本論”說：“今之筹国用者，在于重农桑而已矣。重农桑必先貴粟帛；貴粟帛必先禁淫侈。淫侈禁而后商賈之利微。商賈之利微，而后耕織之人众。耕織之人众，而后粟帛之所出多。粟帛之所出多，而后銀价賤，而后泉貨之源通”（葛士濬“續經世文篇”卷二十四引）。

还有一种办法是完全廢除白銀，用粮食替代白銀在交換上的作用。孙鼎臣（道光乙巳进士）底“論治”說：“天下之生重矣，富之莫如重农，重农必先貴谷，貴谷非廢銀不可。銀不廢則銀与谷爭輕重，輕重之势，谷不可得而貴也。或曰：銀輕賈而谷重滯，黜銀貴谷，民必不便。应之曰：农用粟帛，商用貨財。以錢为貨，而通谷帛之穷，安在其不便乎？其不便者商耳。农便而商不便，則是古征商之意，而吾所以驅天下而归之农之微权也夫”（“論治五”，“續經世文編”卷五十八引）。

这都是企图用封建社会底办法来抵制資本主义国家底侵略。这一班人所說，“驅天下而归之农之微权”是一点也不能发生作用的。

反映开明地主思想的人認識到商业底利益。例如程含章（道光时山东巡撫）說：“天下之大利在洋，而大害亦在洋。”他虽是注重在“論洋害”，但也認識到“洋利”。他主張要分清外国与中国的正当商务与鴉片貿易，加以分別对待。他說：“諸番所产之貨，皆非中国所必需，若大呢、羽毛、嗶嘰、銅、錫、綿花、苏木、藥材、等类，每岁約值千万金，犹是以貨換貨，不必以实銀交易，于中国尚无所妨。惟鴉片一物，彼以至毒之藥，并不自食而乃卖与中国，伤吾民命，耗吾財源。”“必欲正本清源，惟有絕其人不与交通貿易而后可。然試思其人之能絕焉否耶？彼諸番之与中国交易已數百年矣，一旦絕之，

則必同心合力，與我為難。……豈可以兵為戕，而浪開邊衅哉？為今之計，只可嚴諭各國，不許夾帶鴉片，某船有犯者，即封其倉，不許交易”（“論洋害”，見“經世文編”卷二十六引）。

（三）林則徐反抗外國侵略的愛國思想

程含章底這篇文章，還是在道光初年寫的。後來林則徐正是用這種政策解決鴉片問題的。林則徐也認識到與外洋通商之利。他說“廣東利在通商”（“密陳夷務不能歇手片”，“林文忠公政書”乙集，兩廣奏稿卷四）。他一方面反對頑固派底閉關政策，主張准許外國正當商人底合法貿易。他認識到各資本主義國家都是以“逐利”為目的，可以利用他們中間的矛盾。他說：“控馭之法，似可以夷制夷，使其相間相啖”。“若概與之絕，則缺望之後，轉易聯成一氣，勾結圖私”（“復奏曾望顏條陳封禁禁海事宜折”，“林文忠公政書”乙集，兩廣奏稿卷一）。一方面也不怕“開邊衅”，不怕用武力制止外國底侵略。他不承認投降派所說“夷兵之來，系由禁煙而起”。他說：“彼之以鴉片入內地者，早已包存禍心；發之于此時，與發之于異日，其輕重當必有辨矣”（“密陳夷務不能歇手片”）。他底正確的政策，在鴉片戰爭中受到頑固派與投降派底兩面掣肘與攻擊。他個人被迫去職，而中國也在統治階級時戰時“和”的不堅決的抵抗底情形下，受到可耻的失敗。這個失敗使中國降落到半殖民地地位。

林則徐是福建候官人，生于一七八四年。他在清朝也是象一般“成功”的地主階級知識分子一樣，由翰林作官到督撫。可是他是當時地主階級中的愛國的、開明的、進步的人士底領袖人物。以下我們要講的龔自珍、魏源，都是他底朋友。他底另一朋友黃爵滋在一八三四年向清朝道光指出：“鴉片之毒偏布海。”他主張嚴禁鴉

片入口。他說：“異族凶橫，遠人詭詐，柔而撫之，尤必剛而制之”（“綜核名實疏”，盛宣懷“續經世文編”卷十三引）。一八三八年他又告訴道光帝說：“日用未充，民生罕裕，一歲非一歲之比。”“非耗銀于內地，實漏銀于外夷也。”漏銀底原因是由于鴉片流入中國。他主張嚴厲禁煙，吸食者治以死罪（“道光期籌辦夷務始末”卷二）。

黃爵滋底建議引起了廣泛的討論。林則徐贊成黃爵滋底建議。他正作湖廣總督，就在兩湖首先禁煙。林則徐告訴道光帝說：“當鴉片未盛行之時，吸食者不過害及其身，故杖徒已足蔽辜。迨流毒于天下，則為害甚巨，法當嚴。若猶泄泄視之，是使數十年後，中原幾無可以禦敵之兵，且無可以充餉之銀。”“夫財者，億兆養命之源，自當為億兆惜之。果皆散在內地，何妨損上益下，藏富于民。無如漏向外洋，豈宜借寇資盜，不亟為計？”（“錢票無甚害得宜重禁吃煙以杜弊端片”，“林文忠公政書”乙集，湖廣奏稿卷五。）

道光帝不可能“為億兆惜財源”，但是不能不注意到“數十年後，中原幾無可以禦敵之兵，且無可以充餉之銀”。這是與統治階級底利益有密切關係的。他決意禁煙，于一八三八年派林則徐為“欽差大臣”往廣東“查辦海口事件”，就是禁止鴉片入口。這個措施是與人民利益一致的。林則徐擔任起這個維護人民利益底任務，得到人民及當時進步人士底擁護。龔自珍表示要跟他去。並作文章送他，希望他在兩年之內，“使中國十八省，銀價平，物力實，人心定。”文章結尾說：“我之言，公之鵠矣”（“送欽差大臣侯官林公序”，“定庵文集補編”卷四）。龔自珍底這話，代表當時人底希望。當然，從這些話里，我們也可以看出來當時人對於國際情況的隔膜，把打退當時的世界最凶惡的資本主義國家，看得非常容易。

林則徐在廣東發出“諭英吉利國王檄”。檄中指責英國商人，“有夾帶鴉片，誘惑華民，以致毒流各省者。似此但知利己，不顧害

人，乃天理所不容，人情所共憤。”檄文說：“聞該國禁食鴉片甚嚴，是固明知鴉片之為害也。既不使為害于該國，則他國尚不可移害，況中國乎？中國所行于外國者，无一非利人之物，利于食，利于用，并利于轉賣，皆利也。中國曾有一物為害外國否？況如茶葉大黃，外國所不可一日無也。……其餘食物自糖料姜桂而外，用物自綢緞磁器而外，外國所必需者，曷可勝數。而外來之物，皆不過以供玩好，可有可無，既非中國要需，何難閉關絕市。乃天朝于茶絲諸貨，悉任其販運流通，絕不靳惜，無他，利與天下公之也。”（“林文忠公政書”乙集，使粵奏稿卷四）。這篇檄文所表示的思想，例如自居天朝，認為茶葉大黃外國不可一日無等，都表示他對於國際情況的隔膜。但是責備英國之辭，基本上是正確的。我們禁止鴉片入口是完全正義的。

（四）林則徐反抗外國侵略底方法

林則徐反抗外國侵略底方法，有兩方面：一方面是倚靠人民，發動群眾；一方面是“向西方學習”。禁止煙鴉入口，反抗外國侵略，是人民所擁護的。林則徐認識到這一點，也在相當程度內，認識到人民底力量，認識到“民心可用”。他告訴外國的鴉片販子、戰爭販子們說：“察看內地民情，皆動公憤。倘該夷不知改悔，唯利是圖，……即号召民間丁壯，已足制其命而有余”（“諭各國夷人呈繳煙土”，“林文忠公政書”乙集，使粵奏稿卷一）。又告訴廣東人民說：“英吉利人本多狡詐，且以鴉片害我民人性命，騙我內地資財，當亦吾民所共仇共憤。”他号召廣東人民：“如其夷兵船，一進內河，許以人人持刀痛殺”（“英夷鴉片張安民告示”）。英國侵略軍占領定海後，他主張：“與其交鏖于海洋，未必即有把握，莫若誘擒于陸地，逆夷更無能為。或將兵勇扮作鄉民，或將鄉民練為壯勇，陸續回至該

处，詐为見招而返，愿与久居。一經聚有多人，約期动手，杀之将如鷄狗”（“密探定海夷情片”，“林文忠公政書”乙集，两广奏稿卷四）。他主張发动民众，合力抵抗外国侵略，他底軍事路綫含有民族战争底性质。这是外国侵略军队所最怕的一种战争。

林則徐底这种发动民众的政策，在他自己在广东抵抗英国侵略軍底时候，已收到相当的效果。后来三元里人民、昇平社学底抗英运动，都証明人民底力量，若果組織起来，是能抵抗外国侵略的。可是清朝的統治者，一方面固然怕洋人，一方面更怕民众。第一次鴉片战争以后，代表統治者的“官”不是与人民一起去反抗外国侵略，而是镇压人民，屈服于外国侵略，或者是站在外国与人民中間，仿佛是“中立”的地位。夏燮說：那时候是：“官祖民則番怒，祖番則民怒；番以其强，民以其众”（“中西紀事”叙）。林則徐是与“民”站在一起，主張以“民”之“众”，抵“番”之“强”的。这是符合于人民底要求，符合于人民底利益的。

但是林則徐也不是認為专靠群众就可打退英国底侵略，他也深知新式兵器底重要。他說“广东利在通商”，主張用广东底关税，制造船炮，“以通夷之銀，量为防夷之用。”“制炮必求輕利，造船必求极坚”（“密陈夷务不能歇手片”，“林文忠公政書”乙集，两广奏稿卷四）。他在广东“設法密購西洋大銅炮及他夷精制之生鉄大炮，自五千斤至八九千斤不等。务使利于远攻”（“英夷續来兵船情形片”，“林文忠公政書”乙集，两广奏稿卷三）。他被免职后，虎門失守。他与奕山信中說，虎門各炮台及各师船所失炮位“不下五百余尊，其中近年所买夷炮，約居三分之一”（“答奕将军防禦粵省六条”，魏源“海国图志”卷八十引）。他又告訴奕山，要赶紧制造“外海战船”。他說：“洋面海战系英夷长技”，須“制坚厚战船，以資制胜。”他說：“此系海疆长久之計，似宜及早筹办”（同上）。人民也認識到这一

点。一八四三年“番禺紳士潘士成捐資延佛兰西洋官雷壬士于家造洋船洋炮，又造水雷”(魏源“道光夷艘征撫記”下，“圣武記”卷十)。

鴉片战争后，林則徐又被派到云南作总督。云南本是矿产丰富的地方。林則徐提倡开矿。他說：“有土有財，貨原惡其弃于地。因利而利，富仍使之藏于民”(“查勘矿厂情形試行开采折”，“林文忠公政書”丙集，卷九)。关于“官办、民办、商办”底問題，他認為官办“弊資愈多”，主張“招集商民，听其朋資伙办。成則加獎，歇亦不追”(同上)。后来洋务派兴办工业，“官办、民办、商办”成为官僚买办資本与民族資本斗争底中心問題。林則徐对于这个問題的主張，也是正确的。本来中国原有的矿业，是中国資本主义底萌芽。林則徐底主張，是萌芽中的資本主义在思想上的反映。

林則徐对于当时的国际情况，虽仍是隔膜，但他比当时一般人进步底地方是：他自己知道他对于国际情况的隔膜而且极力学习。他知道“夷情叵測，宜周密探報”。他在广州，用人編譯那时在澳門出版的“澳門月報”。他告訴奕山說：“其中所得夷情，实为不少。制馭准备之方，多由此出”(“答奕將軍防禦粵省六条”，“海国图志”卷八十引)。他这种办法使当时的西洋人也很惊异。澳門出的報紙說：中国官府“驕傲自足，輕慢各种蛮夷，不加考究。惟林总督行事全与相反，署中养有善譯之人，又指点洋商通事引水二三十位官府，四处探听，按日呈递亦有他国夷人，甘心討好，將英吉利書譯與与中国。”(“海国图志”卷八十一引)。澳門報紙承認，自从林則徐到广州后，他对于国际情况的知識，是很有进步的。它說：“观其知会英吉利国王第二封信(即上文所引)，即其學識長進之效驗”(同上)。

林則徐在广州主持把翻譯过来的外国講中国的言論，輯为“平事夷言”。他主持把翻譯过来的关于西洋历史地理的材料，收集起

来,名“四洲志”(二書殘稿均見“小方壺齋輿地叢編”)。

倚靠人民禁烟抗英,学习西洋,研究西洋,就这些方面說,林則徐是当时进步的人物。他所作的这些事情,都是与人民利益相符合的。但在另一方面,他仍然是当时清朝封建統治阶级中的一个“大員”,是清朝皇帝的忠臣。一八五〇年太平天国起义,义軍所向无敌。咸丰帝派他为“欽差大臣”去抵抗太平天国。这是他第二次当“欽差大臣”。前一次是到广东抵抗外国侵略,是光荣的;这一次是到广西反革命,是可耻的。他没有走到广西,死于赴任的路上。

魏源底思想

馮友蘭

(一) 魏源底生平及其思想根源

魏源，字默深，湖南邵陽人，于一七九四年（乾隆五十九年）生于一个地主家庭里。一八二二年（道光二年）考中举人后，替賀長齡編輯“皇朝經世文編”。一八三〇年（道光十年）隨楊芳鎮壓回民起義。一八四二年（道光二十二年）參加裕謙底幕府，在浙江抵抗英國侵略。后来裕謙战敗自杀，清朝統治階級向英國投降，魏源“有感而著聖武記”。一八四四年，他中了进士，分发到江苏作知州。一八四六年（道光二十六年）他底母亲去世，他于“丁忧”底时候，作“海國圖志”。一八五三年（咸丰三年）太平天國克復南京时，魏源在江苏高郵州作知州。他在高郵办团練，抵抗太平天國。一八五四年，他参加周天爵底幕府，与太平天國交战。后来回家学佛，于一八五七年（咸丰七年）死于杭州（以上根据魏源底儿子魏耆作的“邵陽魏府君事略”）。

魏源自叙說：“荆楚之南，有积威之民焉，生于乾隆征楚苗之歲一歲（一七九四），中更嘉庆征教匪（一七九三——一八〇二），征海寇（一八〇〇——一八〇九）之歲，迄十八載，畿輔靖賊之歲（嘉庆十八年，一八一三），始貢京師。又迄道光征回疆之歲（道光七年，一八二七）始筮仕京師。……晚侨江淮，海警沓至。愀然触其中之所积”（“聖武記”叙）。清朝异族統治的封建政权，自十八世紀末年，已經受到人民底激烈反抗。魏源所謂“征教匪”、“征海寇”、“征回

疆”都是人民起义而被镇压底事实。对于人民起义，魏源是站在清朝统治政权底立场而加以诬蔑的。在他这一段話中可注意的是魏源确切感觉到他所处时代底变动，感觉到变动来自两方面：一方面是自内的人民起义，表现于他所謂“匪”“寇”，一方面是自外的外国侵略，表现为“海警沓至”。因此使他为“积感之民”。

他所积的“感”之一，就是当时的不当权地主阶级所处的情况。在他所作的“默觚”里有一段，一方面专为“富民”底存在作辯解。他說：“富民，一方之元气”，社会有什么用錢的事全靠“富民”出来維持，是貧民所“依賴”的。一方面他反对政府官吏压迫“富民”。他說：“彼貪人为政也，专朘富民”。“土无富戶则国貧”。他把“富民”分为两种：一种是“有田”的“本富”，就是不当权的地主。一种是“无田”的“末富”，就是商人。他認為在当时混乱的，腐敗的政治下，富民是“可憫”的，而“有田之富民，可憫更甚于无田”。因为“有田之富民，岁輸租稅，供徭役、事事受制于官，一遇飢荒，束手待尽。非若无田富民，逐什一之利，轉販四方，无賦斂徭役，无官吏挾制”（“古微堂內集”卷三）。

据說，湖南有一次大荒年，人沒有飯吃。可是清朝政府催收田賦急，魏源底曾祖父把自己的田卖了，替別人交稅，因此“家亦中落”（魏耆《邵阳魏府君事略》）。魏源感觉到“有田之富民可憫”，因为他底家庭，正是有田的富民，为租稅徭役，在飢荒中破了产的。

在魏源底时代，清朝政治混乱腐敗。西方資本主义侵略，深入到内地，不当权地主阶级，“中落”破产的，是很多的。这一种地主，更能感觉到，封建社会开始崩潰，地主阶级地位，开始动摇。地主本来是瞧不起商人的。可是在这一种新的情况下，他觉得倒是“无田之富民”好一点，有傾向轉化为商人。上面所引魏源底話，正是这一种地主底思想底反映。这一种地主阶级思想也就是魏源底思